

胡经之文集

第一卷

文艺美学

 海天出版社 (中国·深圳)



胡经之文集
第一卷

文艺美学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艺美学 / 胡经之著. — 深圳 : 海天出版社,
2015.10

(胡经之文集 ; 1)

ISBN 978-7-5507-1467-0

I. ①文… II. ①胡… III. ①文艺美学—文集
IV. ①I0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224723号

胡经之文集·第一卷·文艺美学

HUJINGZHI WENJI · DIYIJUAN · WENYI MEIXUE

出 品 人 聂雄前
项目负责人 于志斌
责 任 编 辑 张小娟
责 任 校 对 张 玫 方 琅
责 任 技 编 蔡梅琴
装 帧 设 计 龙瀚文化

出 版 发 行 海天出版社
地 址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综合大厦 (518033)
网 址 www.htph.com.cn
订 购 电 话 0755-83460293 (批发) 83460397 (邮购)
排 版 制 作 深圳市龙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33133493
印 刷 深圳市新联美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51.25
字 数 750千
版 次 2015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10月第1次
定 价 210.00元

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胡經之文集

胡經之



总序：学术志趣因时进

为迎接深圳经济特区成立35周年，海天出版社拟出版我的文集。这也正合我的心意，深圳大学已过“而立”之年，我来特区也已有30年了，愿将这五卷文集献给我最后的精神家园——深圳。饮水思源，感恩北大，亦以此答谢母校对我30多年的教育与培养。

这五卷文集是：第一卷《文艺美学》，第二卷《中国古典文艺学》，第三卷《比较文艺学》，第四卷《文化美学》，第五卷《美的追寻》。

从文集中，可以看到我80年所走的人生道路，反映出我这一生的学术志趣，因时代而生长，留下了时代的痕迹；也录下了我个人的思想演变及局限，折射了我和这个时代的关系，尤其是对深圳经济特区的挚爱。

我的学术志趣，因时代的推移而多有变化，但多变中又有不变。不变的依然是我对真、善、美的向往和追求，尤爱从美学的视界来看文化、艺术和人生，直至自然。



人来到这世上，就和这个世界结下了不解之缘，难解难分。人活在天地之中，天地人和，人方得以生存、发展并逐步走向完善。王阳明说得好，“天地万物与人原为一体，其发窍之最精处，是人心一点灵明”。凭借了“人心一点灵明”，为人处世，接物做事，人既有受动的一面，又有能动的一面。因而人生在世，既能入乎其内，又能出乎其外。马克思把人参与历史活动比作参与历史剧，人在历史活动中既是剧中人，又是剧作者。但个人的历史命运，最终还是受制于时代，个人只能在所处的时代限度内获取自由。所以，马克思说“每一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

在我的人生道路上，曾有过三次转折。第一次是少年时代，由只知闭门读书而走向学生运动，由此而进入社会；第二次是青年时代，由社会活动而转向书斋，在北大走上了学术之路；第三次是壮年时代，在“知天命”之年从北大来到深大，将在此终老。这是我的自主选择，但同时又是时代的召唤、社会的恩赐。至于家庭出身、所受教养并不能完全由我自主，父母师长的作用更大。个人的历史命运离不开时代的变迁，我之所以能走上学术之路，归根结底，还是时代之所赐。所以，我对我们这个伟大时代，始终怀着感激之心，感恩社会。

我出生在江南水乡的一个小康之家，父亲一辈子都在当教师。在那新文化运动正在向江南城镇发展的年代，一个小康之家的收入已能满足全家人的基本生活需要。因之，我从小也就不必为满足温饱而发愁，得以转身接受正在兴起的新式教育，在江南水乡吴文化的熏陶中慢慢长大。及至国难当头，东洋人打进来了，推行奴化教育，我有幸被父亲送进了苏州城里的美国教会学校，躲进了避风港。少时，蛰居古镇梅村多年，也产生了梦想，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就深深吸引着我这少年的心，读了冰心写给小读者看的那些美文，真羡慕她能漂洋过海，见识海外大世面，但这都是些年少无知时的短时幻想，不切实际。

受父辈师长的影响，我逐渐对读书和教书产生了兴趣。父辈师长受蔡元培、梁启超那一辈的启蒙，颇信“教育救国”之说，他们又影响了我这一辈。师长告诉我，一个人在选择人生道路时，梁启超倡导要把个人的“兴味”和对社会的“责任”两大要素结合起来，既对社会负责任，又照顾个人兴趣。我想，我对读书感到有“兴味”，那就选择多读书，读了书再用来教书，负起蔡元培所说的“教育救国”的责任，正好把个人“兴味”和社会“责任”统一起来。所以，我在初中毕业时，就选择进无锡师范，准备将来当教师。

正当我做着读书梦的时候，国内形势发生了激变，促使我投身参加了学生运动。1948年秋冬之际，在决定中国新的历史命运前夕，我参加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选择了为新民主主义而奋斗的道路。在新中国成立前后，近三年的时光，革命情绪高涨，热情澎湃，我从教室走向社会，积极投身社会活动。在那个年代，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作品中的主人

公保尔·柯察金的内心独白成了我的座右铭：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在临死的时候，他就能说：我整个的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奋斗。

新的时代又唤起了我的读书梦。时代发展到新民主主义时期即将向社会主义建设过渡之时，我敏感地觉察到，新中国即将迎来大规模建设的高潮，为适应新的发展需要，我就更需要读书深造。古人说得好，好男儿应志在四方，不能只安于家乡。1952年，正值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之际，我以社会青年同等学力资格考入了北京大学中文系。从此，我可以专心致志地读我感“兴味”的书了，由此通向了学术之路。

但是，在新的时代，学术之路究竟怎么走？当然要有导师指点，但关键还是要靠自己在实践中摸索如何处理好个人“兴味”和社会“责任”的关系。学术研究要重视自己个人的“兴味”，但也要关注时代的需要，担负起社会的“责任”，要将两者统一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我的学术之路，也正是不断尝试把个人“兴味”和社会“责任”结合起来的探索之路。

我的学术志趣最早乃始于美学。最初的美学思索是为了自我解惑，解开我自少时就有的一个困惑：自然没有美吗？少时，读朱光潜给青年的十二封信和第十三封信《谈美》，其中谈及只有艺术才有美，自然本身谈不上美，只有经人的心灵美化才美。这使我困惑不解，进了北大，我就想自我解开这个困惑。那时朱光潜、蔡仪都在北大，但都不开美学课程，我就去登门求教。朱先生仍固执己见，不能解开我的困惑；蔡仪倒是自然美的肯定者，但用典型说来解释自然美，也不能令我信服。于是，我就开始自己去图书馆寻找美学书籍来看，以求自我解惑。1953年整整一年，我的精力集中在阅读辛亥革命前后开始出现的中国现代美学。我从蔡元培、梁启超、王国维开始，陆续读了吕澂、范寿康、张竞生、陈望道、丰子恺、徐庆誉、李安宅、俞公亮等人的美学论著，当然也读了当时都在北大的朱光潜、宗白华、蔡仪、梁宗岱等诸位的美学。在新文化运动推动而发展起来的中国现代美学，对美的阐释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并没有解我的

惑。但是,我发现那个时代的美学,并不只是关注文学艺术,也指向人生实践和人格塑造。就是以美学来阐释文学艺术的功能,也不是只为满足当下的美的享受,而认为它也能提高人辨别美丑的审美能力,进而培养人的创造能力。蔡元培倡导美育,更把审美教育提高到培养崇高境界和优美人格的地位。梁启超发起文学革命,更想以此来推动社会革命。在那个时代的美学理论中,移情论确实影响甚广,但人生论、价值论的影响也不小,这些为我以后的思索,开拓了美学视野。

中国在20世纪前50年,现代美学虽才初起,大多重在移植西方美学,却已开启了一条新路,从西方美学的中国化逐渐走向和中国人自己的审美经验相结合的道路。我读过这些美学论著之后,曾想对这半个世纪的美学做个梳理,然后在作毕业论文时,写篇《美学初起半世纪》。如果沿着这条思路发展,我的学术志趣可能就会趋向于专攻中国现代美学。

我这第一个学术梦还未得以实现,就因时势的变化而转移了我的学术视野。

正当我沉湎于中国现代美学之际,北大学习苏联的高潮正向前推进。1954年春,校长马寅初和副校长江隆基为文科请来了苏联专家毕达可夫,开设了文艺学引论;还在中文系成立了文艺理论教研室,开办文艺理论研究和进修班,为国内培养文艺学研究生和进修教师。我当时还是三年级学生,但得到了系主任杨晦的特批,允许我听了一年多的文艺学引论课程。按苏联专家的规定,我也必须在钱学熙教授的指导下,撰写结业论文。于是,我在1955年秋写了一篇《论文学的人民性——兼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记下了我初学苏联式文艺学的心得,这是我第一次学写学术论文。在那个时代,中国闭关自守,对外只向苏联一边倒,若要了解马克思主义,此是唯一途径,这是当时的时代局限。但这为我打开了一扇汲取域外先进文化之门,从此,我一直关注着苏联的文艺学和美学。特别在斯大林时代之后,苏联美学界、文艺界重新阐释马克思主义经典,使我受益匪浅。

我一直关注苏联文化学派、审美学派的学术动向,但我不想以此作为我的研究方向。我的学术方向,仍在摸索的路上。1956年,杨晦开始招收文艺学副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已转向中国文艺思想史,我投在他门下,

开始钻研起古典来。在两年多的时光里，我真的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从庄子、孔子起，一心一意、专心致志地攻读古典文论，做了摘录卡片，记了读书笔记。我深感中国的“文学”范围实在太广，我的思考逐渐转向对“纯文学”和“杂文学”的联系和区别上面，想结合中国文学史做些历史的考察，从理论上予以阐明。读了两年多古书，还没有来得及动手写副博士论文，我的学术之路又有了一次转折，最后终于确定了今后发展的学术大方向。

就在1958年秋，周扬带了邵荃麟、何其芳、张光年、林默涵等人，主动为北京大学开设了“建设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讲座，竭力倡导厚今薄古，面向现实，要北大为建设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做出贡献。我受北大之命，担任了周扬这个讲座的助教，协助周扬等和北大学生沟通。在那个意气风发的年代，周扬的第一讲，就开门见山地提出要“建设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这个宏伟目标，令人鼓舞，一下就吸引了我。我终于明确了我在今后要发展的大方向，愿为建设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美学而奋斗，心里也就踏实起来。我也从此明白了，以前涉猎过的中国现代美学、古典文论以及苏联的文艺学、美学等等，正可以作为建设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珍贵资料 and 思想营养。那年我25岁，离我副博士研究生毕业还有两年，尚来得及重新确定我要写什么样的副博士论文。

学术大方向一定，我就更多关心起当下现实来，以弥补以前的不足。我先是参加了《文艺报》发起的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讨论会，发表了我的理解。后来又应《文学评论》之约，写了《理想和现实在文学中的辩证结合》。当时思想单纯，对艺术创造的丰富和复杂尚无清楚的认识，我虽然首肯创作方法可以多种多样，但我紧跟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断定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是历史上最好的创作方法。为了推进文艺评论，《文艺报》的张光年、侯金镜在社外聘了李希凡、李厚、严家炎、王世德和我为特约评论员，我也积极参与了当时的文艺评论，尝试以历史观点和美学观点来评论一些作品。我为李英儒的《野火春风斗古城》写过一本评论小册，对王愿坚的短篇小说也作过一些评介，但这都是粗浅的尝试，我只向文坛跨进了半步，后来就没有再向文艺评论上发展，很快又重返美学之路。

我在1960年完成了副博士毕业论文《为何古典作品至今还有艺术魅力》。我之所以最后选定这个课题，就是想接续马克思之问，即古希腊艺术和史诗为什么会有永久的艺术魅力，但我想解决的是如何看待中国古典作品的问题。我尝试从今天的欣赏主体和古典的作品客体这两方面关系的结合来分析艺术魅力。欣赏主体的今人须有一定的文化素养和审美能力，方能欣赏古典作品，但古典作品本身亦须具备一定的品性，真、善、美就是文艺的优越品性，所以才具有永恒价值。文学艺术的最高境界应是真、善、美的结合和统一，但具体作品要具体分析，一些作品，或重在真，或重在善，或重在美，重心会有所不同，因而具有不同的艺术魅力。古典作品之所以有不朽的魅力，正在于表现了真、善、美。我从自己的审美经验出发，对大自然之美，情有独钟、赞叹有加，引用了不少山水诗文作证。当时正在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的蔡仪，乃我导师杨晦的好友，参与了论文评审，我的论文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不久，1961年春，蔡仪受命主编全国高校文科教材《文学概论》，杨晦推荐我去参编，蔡仪欣然接纳，要我编撰第一章《文学是反映社会生活的特殊的意识形态》。为领会和贯彻主编的意图，我重读了马克思主义经典，重温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的基本原理，作为此章的指导。马克思、恩格斯说得好：“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而现实生活，就“包括了一个广阔范围的多样性活动和世界的实际关系”。文学要反映现实生活，作家、艺术家就必须深入实际生活，不仅要“对现实关系具有深刻理解”，而且还要能“真实地评述人类关系”。因此，文学对生活的反映，就包含着对生活的理解和评价，是对生活做诗意的裁判，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

编书的两年多时间，正是我在学术上得以提升的大好时机，那是一个谈笑有鸿儒、相互探学问的时代。多年之后，王朝闻和我还不时谈起，常怀念这段岁月，以后再也没有那样清静的日子了。那时，王朝闻的《美学概论》组、唐弢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组和蔡仪的《文学概论》组，全体编写人都住在中央高级党校的同一个庭院里，一起用餐，天天见面、散步、交流学问，乐在其中。我庆幸我终于走上了一条最适合我自己而又能对社会做贡献的人生道路。马克思在中学时对选择职业所说的那番话，

就永远刻在了我的心头：

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善。不应认为，这两种利益是敌对的，互相冲突的，一种利益必须消灭另一种的；人类的天性本来就是这样：人们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善，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才能使自己也达到完美。

二

三十而立，我从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回到北大教书，有了安身立命之地，确立了向美学发展的方向。正是因为有了对真、善、美的向往，所以后来我虽历经动荡，在那最艰苦的岁月里，仍能自我消解所受的精神创伤，获得一丝精神慰藉。

“文化大革命”，大革了文化的命，我也差一点倒在鲤鱼洲上，美学梦自然不能再做了。所幸马列经典还能读，《红楼梦》也还可以评。于是，在那动荡的岁月里，我做了两件事：一是钻研《资本论》，但我并非要研究经济学说，而是想窥探价值学说，弄清审美价值和交换价值、使用价值等价值是什么关系。马克思的价值论，科学地阐明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严格区别，而审美价值不具实用价值，但属于使用价值的一种。我觉得，我们的美学就应沿着马克思的这个思路，从使用价值入手，探索审美价值的奥秘。二是埋头读了几遍《红楼梦》，追随毛泽东的思路，从宽广的社会、历史视角来评说这部小说。为了证实《红楼梦》是我国历史上最好的一部小说，我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查阅了晚清的全部线装小说，浏览了一遍，以获得直接的验证。我也觉得，把《红楼梦》看作封建家族兴衰史，确比“自传说”、“爱情说”、“叛逆说”等前进了一步。但当时对这部艺术作品忽视了做美学的分析，所以，一旦改革开放，我就写了《美学与红学》等文，倡导对《红楼梦》做美学的研究，我把这些从美学上评《红楼梦》的论文收入了《中国古典文艺学》卷中。

改革开放给予我的生命第二次解放，使我精神振奋，学术热情空前高涨。改革开放之初，学术界的精神生产力获得解放，美学热兴起，对未来

充满了憧憬和希望。从我当时的教学需要出发,我的美学视野先是集中在文艺美学的建构,尝试熔美学和文艺学为一炉。

1984年初春,中华全国美学学会在昆明成立,朱光潜(西语系)、杨辛(哲学系)和我(中文系)三人受邀代表北大与会。主持学术研讨会的李泽厚要我在大会上谈中国美学史的问题,我遵嘱在大会上宣读了《中国美学史方法论略论》一文——后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1980)——希望中国美学史既不要写成抽象概念史,又不要变成文学艺术史,而要关注“形而中”,找到“形而上”和“形而下”之间的中轴线。但在高校美学分会成立大会上,我就敞开心扉自由谈,全力倡导在高校的中文学科和艺术院系开设一门区别于哲学美学的文艺美学。我当时在开设文学概论之外,已在准备为中文、西语、东语、俄语等系的高年级学生,开设这门新课。我的这一倡议,先后得到了朱光潜、宗白华、王朝闻、伍蠡甫、洪毅然等老一辈美学家的支持,更获得了艺术院校一些教师的热烈响应。

当年下半年,我就在北大开了文艺美学一课。那时,我已接受了价值学说,尝试用价值论解释美丑。美是正价值,丑是负价值,有些新意,所以引起一些学生的兴趣。次年,即1981年,我接续杨晦开始招收文艺学硕士研究生。在杨晦的支持下,我说服了北大研究生部,在文艺学专业之下,新辟了一个文艺美学方向,和文艺理论分开。我招收的文艺美学第一届研究生有三位:王一川、陈伟和丁涛,以后又陆续招进了王岳川、张首映、王坤、谢欣、荣伟、柳杰等多人。北师大童庆炳也选派了青年教师齐大卫到我这里进修。文艺美学这一专业方向终于得到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承认。也就在1982年,成立不久的北京大学出版社要我和叶朗、江溶等组织编撰“北京大学文艺美学丛书”。我在1982年年初出版的《美学向导》一书中发表了《文艺美学及其他》一文,阐释了我对文艺美学的学科定位和研究对象。此文后来被收入由钟敬文、启功主编的“二十世纪全球文学经典珍藏”(2004),主持其中的《中国文论经典》卷编选的童庆炳教授称此文“从学科上对‘文艺美学’进行了清晰定位,奠定了八九十年代文艺美学的学科基础”。

20世纪80年代,在我国既是一个文艺复兴时代,又是一个新启蒙时代。美学的兴起,对文艺复兴和新启蒙都发挥了积极推动作用,激励

着人们向着更美好的未来奋进。我们这一代，虽在新中国成长，但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丢失了10多年从事学术研究的美好时光，就想争分夺秒，多做一些补偿。那时，高校尚无课题申请之规，学术研究全由教师自定。我在讲课之外，一边忙着撰写讲稿，一边还要忙写论文发表。改革开放之始的那几年，我每年都要写数篇万字以上的论文，如《艺术掌握世界的方式》《艺术美略论》《论审美活动》等。近3万字的《论艺术形象》一文，是在1980年所写，最早发表在上海文艺出版社的《文艺论丛》（1981），后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收入《中国新文艺大系·理论集》（1988）。90年代，美国美学家布洛克和中国美学家朱立元教授合作编译了一本推荐中国当代美学的文选，介绍给英语世界，我的这篇《论艺术形象》也被收进去了。我在这些论文和讲稿的基础上，写成了《文艺美学》一书，初版在1989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10年之后，适逢北大百年校庆，北大出版社又从原来的“文艺美学丛书”（约有30多种）中挑选了10种，作为“北京大学文艺美学精选丛书”，予以再版。我就对《文艺美学》做了较大的增补和修改，成了第二版。我感到些许欣慰的是，《文艺美学》一书，不仅被一些高校列为文艺学研究生的参考用书，而且，其中一节还被选进了高中必读语文读本。人民教育出版社在2001年新编面向21世纪的语文教材，将《文艺美学》中的《中国古典诗词虚实相生的取境美》一节，编入了高中语文读本第五册，和宗白华等的美文在一起，走进了高中课堂。如今，我把《文艺美学》一书以及文艺美学的一些散论，收集在一起，成为文集的第一卷。

北大30多年，我基本上是围绕着“书”这个轴心在运转：读书—教书—评书—编书—写书。在这些岁月中，我评别人的书不多，编的书却颇多。为了发展文艺美学，推进学科建设，我广泛搜集资料，中国古典美学、现代美学以及西方文艺学，都有所涉猎，然后编成教学参考资料，以适应教学之需，也为我撰写《文艺美学》准备理论资料。我在王一川、陈伟、丁涛和王岳川的协助下，先是出版了《中国古典美学丛编》三卷，又在王一川、陈伟的参与下，出版了《中国现代美学丛编》。后来，又有李健的积极参与，出版了三卷《中国古典文艺学丛编》。国门开放之初，高校教育急需开设西方文艺理论的课程，却无一本介绍西方文艺理论的教材，国家教

育委员会教材办公室敦促我投身这一教材建设。我和伍鑫甫主编了一套《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三卷,作为教学参考资料,以应急需。随之,我主编的《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成为高校的教科书。新世纪到来之际,我请王岳川、李衍柱两位担任副主编,又请钱中文为顾问,对已得了高等教育优秀教材奖的《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做了较大修改和增补,成为第二版,继续在全国高校的文科中使用。在国家教育委员会的一再关切中,我又和张首映合撰了《西方二十世纪文论史》,同时编选了四卷《西方二十世纪文论选》一起出版,受到了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奖励。受教育部博士科研点之约,我和王岳川共同主编了《美学文艺学方法论》一书,张法、王一川、张首映、尹鸿等均撰有专稿。回想那几年,我为当时的学科建设,真的是全力以赴,不遗余力,想把以前丢失的时光抢回来。我主编的文艺学和美学的教学参考资料,出版了近800万字。

三

正当我紧张而愉快地围着“教书—编书—写书”连轴转的时候,我的人生发生了第三次也是最大的一次转折。1984年在邓小平第一次南方视察的前夕,深圳的一声呼唤,我就来到了正处在改革前沿的这方热土。

深圳在成为经济特区之后,市长梁湘在经济还很困难的情况下,就下决心要创办一所新型大学。清华大学副校长张维院士受聘为深圳大学首任校长,他要请北大人去创办外文系和中文系。北大的副教务长李赋宁已答应去当外文系主任,随后就要确定中文系的人选。1984年年初,张维院士在清华园寓所,约见了汤一介和我两人。他开门见山,就说深大要创办中文系,想发展新兴学科,经钱逊竭力推荐,要请汤一介去创办国学研究所,要乐黛云和我去创办中文系。等乐黛云从美国回来,我们三个人就一同去深圳。

当时,汤一介和我都已招了研究生,忙得不可开交,怎么去得了深圳?张维院士早就考察过海外多地,见多识广,所以胸有成竹。他告诉我俩,这不用发愁,我们三个人不用调离北大,照常可以在北大教书,研究学问,去深圳可以采用轮换的办法。这样,我一年中,半年可以在北大,半年则去

深圳，等中文系的教学秩序、学科方向建立起来，就可以来去自由了。他还郑重许诺，我们可以从北大选挑一些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去深圳参与创业，优先调进北大人。这让我们有了较大的自由。在此之前，北大的张卫东、刘丽川、钱学烈已先来了；我们去后，又陆续调进了郁龙余、刘小枫、章必功、景海峰等北大学子，为深大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受张维院士约见不久，恰逢邓小平南方视察就去了深圳，我们深受鼓舞。1984年暑假一过，我们北大的四个人，李赋宁、汤一介、乐黛云（已从美国访学回来）和我，就跟着校长张维院士来到了深圳大学，从此就和深圳结下了不解之缘。那年，我刚过“知天命”之年，乐黛云比我大两岁，汤一介比我大五岁，都是我的学长。

来到了这块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之后，我的学术视野迅速扩大，从文学艺术到社会文化，从精英文化到大众文化，从中国文化到国际文化，都涌入了我的学术视野。更进一步，我就不仅只满足于“读万卷书”，而是走出书斋，要想“行万里路”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生理想，到了深圳我才得以全面实现。

我们到深圳，开始不被北大人理解。听说我要到深圳，有好心人就劝我，到那边陲小镇去干什么？在北大这最高学府安心当教授，教教书，安度晚年算了，别去那里折腾了。但我们到深大，却得到了时任北大副校长季羨林的支持，鼓励我们不妨在深圳一试，说不定会闯出一条促进国际文化交流的新路。季老在多年前就已痛感北大封闭自守之弊，早在1981年1月就带头筹建了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会，英语系的杨周翰、李赋宁、张隆溪，西语系的孙凤城，俄语系的岳凤麟，中文系的吴组缃、乐黛云和我，都积极响应，热心参与筹建，从而在北大开始了中外学术文化交流。我也为此在《光明日报》陆续发表了《比较文艺学漫说》《艺术的民族特色》等文，以期推进。在此后两年间，我和季老、杨周翰、张隆溪等曾先后接待了叶维廉、刘若愚、李达三、叶嘉莹、袁鹤翔等海外学者的来访。当时，北大要推进国际文化交流仍是困难重重。北大人想出国，难上加难。就是海外学者来访，也都要先从海外飞抵香港，再从香港转到深圳、广州，才能到达北京。那时，乐黛云已去美国专攻比较文学，季老听我说要到深圳，他几次叮嘱，要乘此大好时机，去深圳大学建立一个国际学术交

流的平台,和北大的比较文学研究中心,南北呼应,相互促进。

初去深圳,我也深受一些美学同行的鼓舞。1984年五一节,我在厦门参加中华美学会议之后,就到汕头、深圳察看。在深圳大学的铁皮房食堂里巧遇李泽厚、蒋孔阳、刘纲纪,他们也到这里来考察。他们为我分析,深圳和香港只一河之隔,来往方便,香港乃国际化大都市,深圳可借此地理优势,探索一下国际学术交流的新路,不妨来此一试。当时我正在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很想多读些新近材料。蒋孔阳就告诉我,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图书资料极丰富,在深圳可以就近去查阅。听他们一番话,我也颇为动心。

我们都记着季羨林的嘱咐,来深大后不久,就着手准备打造国际学术交流平台。我们在创建中文系的同时,就成立了国学研究所,由汤一介任所长;又成立了比较文学研究所,并开始准备在此召开国际研讨会,开启国际学术交流。在乐黛云的积极奔走下,一年后即1985年,我们就举办了首届比较文学国际研讨会,在蛇口的“海上世界”宣告了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的成立。季羨林、杨周翰都来了,我们一致推举季羨林任名誉会长,杨周翰为会长。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会长佛克马,以及英、法、美、日等国的比较文学学会会长都来到了深圳。一下有那么多的国际著名学者、文化名人到此,这是深圳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汤一介的国学研究所也在这一年张罗了一次“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的协调会议,想借此沟通海内外的国学研究,推进国际交流。上海的王元化、张锡昌、朱维铮,武汉的冯天瑜,广州的张磊、袁伟时,以及海外学者杜维明、汉学家魏斐德等都来到了深圳,在学界引起关注。紧接着,1986年,我和徐葆煜在深圳大学又举办了一次更为盛大的“港澳台暨海外华文文学”的国际研讨会,在港、澳、台华人作家之外,第一次有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及东南亚的华人作家与会,盛况空前。当时,市长梁湘和副市长邹尔康也被吸引来了,作为普通与会者,静坐在台下,潜心听海外作家发表意见,成为海内外学者文人的美谈。由此开始,我们真的在深圳大学打造了一个人文学科国际学术交流的平台。此后,我们又陆续在此举办了西方文艺理论研讨会、国际美学研讨会等,积极推进国际学术文化交流。

我都没有想到,在深圳只两三年工夫,国际学术文化交流的局面就打

开了，这在北京就很难想象。邓小平总结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最大的教训就是，自反右斗争以后，犯了错误而不自觉：“对外封闭，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闭关锁国，闭目塞听，其结果就是不知道世界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故步自封，自以为是。如今改革开放了，我也要尝试放开眼光，以新眼看世界。

万里之行，始于足下。我开始跨过深圳河、罗湖桥，先和香港的学术界有了交往。在深圳大学中文系成立大会上，我们就迎来了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的著名学者饶宗颐、罗亢烈，东亚大学（澳门大学前身）的程祥徽，他们专程前来祝贺。从此，我开始了和香港学界的学术交往，建立了经常的学术联系。那时，从内地到香港去，手续复杂，极为麻烦，都必须到北京，找港澳办，办理专程的通行证，比办理出国护照还困难。深圳经济特区成立后，深圳市政府自己可以办理一种只许深圳人赴港的特区通行证，不要再去北京转一大圈。为方便我去香港，在副市长邹尔康的关照下，深圳市政府特别优待，给发了一个可以常年自由出入香港的通行证。从此，香港有什么重要的学术交流活动，港大、港中大的朋友打一个电话过来，我就可以随时赴港参加聚会。那时能赴港的人还不多，跨过罗湖桥，登上轻轨铁路，半个多小时就可直达维多利亚港。到香港中文大学就更近了，那感觉，比从北大乘车到王府井参加文联的活动还要方便。香港中文大学邀我去访学，在新亚书院山顶的会友楼住了一阵，作了《中国当代美学的嬗变》演讲，饶宗颐、李达三、袁鹤翔、黄继持、黄德伟等都来了，还认识了即将上任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的金耀基、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陈方正等学者。为搜集西方文艺理论的最新资料，我多次去港大、港中大，朋友们都热情相助，为我找书复印。

香港不愧为国际大都会，当时的传媒已很发达。我在深圳的最初数年，通过香港的传媒，才得以逐渐了解国际文化。那时深圳的电视台初建，主要播放新闻，祝希娟也刚从上海调来不久，正在准备文艺节目的传播。但香港在当时已有四个电视台，两个台用粤语播放，两个台用英语播放。那两个英语台，每晚都要放英语电影，但配有中文字幕。那时我住后海湾的海涛楼，楼前就是红树林，对面就是香港，海阔天空，电视影像特别清晰。这样，我每天晚上能看到一部或两部国外影片，很多都是得了